

问题与文本

——新世纪域外文学探索

主编摇张摇杰摇吕洪灵

河海大学出版社

代

序

摇摇

摇摇摇摇问题与文本：

摇摇摇摇外国文学研究的两个中心话题

又是一个岁末年初,又是一个“盘点”和“规划”的时刻。回眸自 1993 年 1 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年会,到 1995 年 1 月在无锡江南大学与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联合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围绕两次会议的主题——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文本意识”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很自然,这两次会议遴选出的 100 篇论文就编辑成了本论文集,也就是《域外文学论丛》第八辑。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文本意识”看起来似乎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其实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所谓“问题意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二是外国文学研究引发的思考,提出的问题。前者就涉及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对创作文本自身关注不够的问题,后者则强调要注重发掘外国文学创作文本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对其归纳出简单的结论和评价。所谓“文本意识”也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要侧重探讨由对“文本”的不同阐释所带来的一系列研究问题,二是突出“文本”是外国文学研究的

本体,提出外国文学批评的建构问题。

这里实际上反映出了两种批评态度: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的学者们,其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外国文学创作的,而以“文本意识”为批评理念的研究者们则是从“本体论”的视角来探讨外国文学创作的。无论是“认识”或“思维”的研究,还是“本体”或“文本”的回归,都表现出江苏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们探索的执著与深入。

本论文集的第一篇论文“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也谈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专门从理论上探讨“问题意识”的。论文首先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进行了质疑,指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外国文学创作现象和批评理论的梳理和分析,从中得出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评价。因为每当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时,这一结论又常常会被后人或同时代人重新认识或批判,甚至有时还会被自己否定。这样,论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得出评价性的结论,还是在引发新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能力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另辟蹊径,通过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来解决老问题,通过对问题的思考来推进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试图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探索一条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的途径。

随后,武跃速的“价值困境中的持续追问”、朱洪祥的“是语言的艺术,还是艺术的语言?”、柏云彩的“解读《等待戈多》文本的‘反戏剧’的艺术创作特征”、谷蕾的“《黑暗的心》中符号链的对立与消解”、叶琳的“从‘可写的’文本看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和王成军的“对话·叙事·道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叙事伦理”等论文均结合具体外国文学创作文本,或以提问的方式,或以解读和对话的方式,深入思考和解析了外国文学创作文本中蕴涵

的深层问题，令人深思。

显然，在从问题、解读和对话的视角探讨外国文学创作时，关注文本本身已经成为江苏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们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也无形中为进一步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文本意识奠定了基础。

提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文本意识，一般外国文学批评界都认为，主要是指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以文学作品研究为中心，尤其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人云亦云。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文本意识的强调也正是针对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批评随意性而提出来的。然而，仅仅如此又是明显不够的。在解构浪潮之后，外国文学批评进入建构的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文本意识被重新提出来，我们认为，在这里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外国文学研究的重心应该由对创作文本意义的解构，转向对文本意义中心的重新确立。这其实也是一种研究的本体论回归。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起源到 17 世纪的本体论研究、由 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开创的认识论研究直至席卷 18 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之后，又再次转向了本体论。

第二，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由发掘创作文本的思想内容转向探讨文本结构和形式。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其实，从外国文学创作体裁和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尚无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史，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创作的思想史。文本的形式构造应该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焦距的中心。

第三，外国文学研究的观念应该由创作文本的依附性转向创作文本的主体性。这里实际上是想说明，任何一个创作文本不应该只是依附于作者而存在，文本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的主体性。因此，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只是为了发掘文本反映了作者的什么思想，而更重要的是要发现文本作为独立主体，其意义的复杂性、与读者的对话性以及文本自身的问题性，同时还要深

入揭示这种复杂性、对话性及问题性的艺术表现构成。

本论文集的大部分论文都是以创作文本为研究对象的,重点在西方经典名著的研究,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红字》、《紫色》《名利场》、《挂起来的人》、《觉醒》、《秀拉》、《纠正》、《看不见的人》等。研究的视角也是丰富多彩的。陈许等侧重于对作品的社会历史批评,刘剑锋等却偏爱对文本的艺术形式的分析,王成军等在论文中采用了叙事伦理批评的方法,傅俊等则着眼于文本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唐建清等对不同文本的分析,运用起了擅长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等。论文集最后的两篇论文还探讨了高校英美文学的教学。这显示出江苏外国文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顺便说一句,本论文集主要收集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论文,特别是青年学者的论文。这让我们看到了江苏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如果说本论文集还存在着什么不足的话,主要是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欧美和日本等区域,而对于除日本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学研究甚少。

本论文集的出版应该感谢学会挂靠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感谢河海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周勤老师给予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要出版这样的学术论文集几乎是不可能的。

“问题”和“文本”可以说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永恒的中心话题,我们的探索还只是刚刚起步。如果这本小小的论文集能够成为我们探索之路上的一颗铺路石的话,也就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了。

编摇者

2006年 11月 猿日于南京北极阁

目 录

多一点问题 少一点结论

摇摇——也谈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轱摇杰 轱摇录

价值困境中的持续追问：《银碟》在贝娄
摇摇小说中的意义 轱跃速 轱摇圆

在路上的华裔嬉皮士
摇摇——论汤亭亭在《孙行者》中的戏仿 轱摇红 轱摇缘

库柏与美国西部小说 轱摇许 轱摇远

设文之体有常摇变文之数无方
摇摇——论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轨迹 轱立伟 轱摇愿

从“挂起来的人”到“精神群体”
摇摇——试论贝娄《挂起来的人》的伦理观照 轱摇平 轱摇怨

《第二十二条军规》
摇摇——黑色幽默的基石之作 轱摇岚 轱摇远

师承传统摇契合时代
摇摇——浅析德拉布尔的小说创作 轱雪梅 轱摇源

女性自我——一个难圆之梦
摇摇——简评《纠正》中的德妮丝 轱晓芳 轱摇苑

坠落后的精神升华
摇摇——《看不见的人》的尾声 轱摇易 轱摇愿

论温迪·瓦萨斯坦的女性主义戏剧创作 轱庆宏 轱摇愿

镜像阶段的心理成长过程
摇摇——《红字》人物心理 轱安春摇张海蓉 轱摇怨

摇

身体政治在《秀拉》中的再现

摇摇——析《秀拉》中祖孙三代女性的身体反抗 轶丽娟

轶丽娟

失落的现代伊甸园

摇摇——波特《中午酒》的神话原型模式 轶莹波

轶莹波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

摇摇——评豪威尔斯的《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轶摇怡

轶摇怡

书信体叙述模式在小说《紫色》中的运用 轶摇晓

轶摇晓

《嘉莉妹妹》中的三个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轶林林

轶林林

个人的悲剧与社会的悲哀

摇摇——再读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轶摇欢

轶摇欢

英美意象派诗歌艺术初探 轶剑锋

轶剑锋

是语言的艺术 还是艺术的语言

摇摇——对哈罗德·品脱语言哲学的研究 轶洪祥

轶洪祥

“他者”的挣扎与拯救

摇摇——《到灯塔去》中莉丽形象之解读 轶庚华

轶庚华

性别·种族·暴力

摇摇——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传记作品《爱犬弗拉

狮传》 轶孟举

轶孟举

解读《等待戈多》文本的“反戏剧”

摇摇的艺术创作特征 轶云彩

轶云彩

《黑暗的心》中符号链的对立与消解 轶摇蕾

轶摇蕾

“约翰生博士的字典”

摇摇——评《名利场》中“物”的叙事功能 轶俊萍

轶俊萍

摇

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轱摇摇俊	轱圆圆
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	
摇摇——一部“女书” 轱清琦	轱圆缘
本体和本土	
摇摇——加拿大女性戏剧成长之魂 轱庆庆	轱圆怨
从“可写的”文本看夏目漱石的小说《心》 轱摇琳	轱圆缘
冈本加野子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性	
摇摇——浅析《花儿是坚韧的》 轱摇青	轱圆远
简析野间宏的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 轱摇琳	轱圆怨
对话·叙事·道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摇摇的叙事伦理 轱成军	轱圆苑
《城市与狗》的意象分析 轱金玲	轱圆怨
重述神话：《碧奴》与《珀涅罗珀记》 轱建清	轱圆苑
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与欧洲早期比较文学	
摇摇研究的关系 轱义海	轱圆苑
西方童话中女性形象创作范式刍论 轱丽明 轱吕芳慧	轱圆怨
中西惩戒神话分析 轱摇红	轱圆愿
修辞赏析的细与大	
摇摇——以《我有一个梦想》文本为例 轱同林	轱圆圆
论大学英语中的英美文学教学 轱玉花	轱圆怨
关于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 轱晓辉	轱圆愿

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

——也谈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 张摇杰 ·

一般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对外国文学创作现象、批评及其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通过分析和梳理，总结出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评价，客观地描述外国文学史的进程，从而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国外文学，为批评和理论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比如某某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某部作品表现出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什么？某段时期的文学主潮是什么？各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特点是什么？文艺的本质是什么？等等。然而，有趣的是，每当我们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时，这一结论又常常会被后人或同时代人重新认识或批判，甚至有时还会被自己否定。难道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尔特不是在与同伴创建了结构主义大厦之后，又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大厦，构建起解构主义的理论吗？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解构主义又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境地。每当我们自以为是在客观地描述外国文学发展运行的轨迹时，我们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所处意识形态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尽管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种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不断的否定和批判。其实，完全的继承是不可能的，继承是相对的，批判则是绝对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阐释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外国文

学的批评与阐释就更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性,也不只是文学本身阐释的多样性,而且还在于外国文学的创作复杂性、文化差异性、批评的不确定性和认识的未完成性。可以说,任何一部外国文学史都只是一部当代批评家笔下的外国文学史。

这里就自然会产生出一个令人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外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值得深思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针对千姿百态的外国文学现象,我们是应该努力去得出一系列相对公允的评价性结论,对外国文学发展进程进行客观的梳理,还是应该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引发新的思考?我们是否有能力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另辟研究蹊径,用新问题来替换老问题,通过问题的思考来推进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呢?这样,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也就成为了本文论述的中心话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所涉及的外国文学研究主要是指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不涉及东方文学。

摇摇一、真理的存在:一根无限的问题链

加拿大著名学者 晕·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指出:“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史学,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批评家必须在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事件,在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思想。”[员]尽管弗莱的思想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遭到了当代西方叙事学文论家的猛烈批评,但是弗莱肯定哲学是文学的思想,是文学的灵魂,却一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许没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史又是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美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文论史

与美学史、哲学史是密切相联的。因此,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应该从源头着手,从西方哲学、美学的发展历程来考察。无论是西方哲学史、美学史,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史,其实都是一个对真理不断探索的过程,都要对真理是否存在和怎样存在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国内外学术界往往把 19 世纪下半期以前的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大致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三个阶段[19]。古希腊罗马哲学探索的核心问题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其发展全过程基本上都贯穿着关于“是”或“存在”学说的本体论探讨,各种理论流派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中世纪哲学和美学实际上也从未离开过神学本体论这一主题。到了 16 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即“认识论的转向”,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何以可能?”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追问:“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培根代表经验论者探寻:“我们是怎样知道的?”由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 16 世纪至 18 世纪的两百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部分由于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更多地与 18 世纪实证主义有关,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到了语言论轴心,理论界开始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的?”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学者们则又发现语言是文化的语言,因此又出现了“文化哲学转向”,重点回答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下我们表述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的?”[20]~ [21]

人类在每一次推进对问题的探讨中,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驾驭自己的研究对象。然而,也正是这一个个的“退缩”,一个个的更换问题,却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真理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的存在应该是一根无限的问题链,是一个永远的运动过程。也就是说,真理不是以结论的方式,而是以问题

的方式存在着的,每一次探索的成功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其实,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和创作思潮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总是希望对批评对象和批评理论做出一个大家能够相对接受的结论,但是结论提出之时也就是被否定之际,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进程都是处在不断批判和否定的动态发展之中。从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批评流派,在19世纪及其以前主要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展开的,到了19世纪上半期表现主义等流派高举起批判理性主义的旗帜,西方文坛涌起了非理性主义的浪潮,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期,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又推动着西方文论重新回到理性主义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批评流派,也相应地完成了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然后再回到新的认识论批评的运行轨迹。19世纪西方文论所走过的这条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之路是清晰可见的。当然,这种不断批判的发展历程也是与研究思维范式在逻辑学与现象学之间来回摆动密切相关的。

宏观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历程是这样,某一个具体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例,当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的理论,因为既然是无意识,为什么能够意识得如此清楚呢?显然是把无意识意识化了。接着,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又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否定了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雅克·拉康则把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对无意识结构进行了语言学的阐释[源]。精神分析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如此,文学创作的思潮就更是这样。从文学创作思潮的总体变化来看,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强调的是“环境”对“人”的作用,也就是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该流派作家往往通过描写恶劣的社会环境对“小人物”、“多余人”等形象的扼杀,反过来批判社会环境,这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

量之所在。到了 19 世纪初,无论是现实主义艺术还是现代主义艺术都更强调“人”自身的作用,“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甚至表现人的意识流活动。这时创作的重心由“环境”转向了“人”。然而,到 19 世纪下半期,文学创作思潮又开始渐渐回到了“环境”,注重表现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并由此来解构人本中心。从“环境”到“人”再到“环境”,这是一个批判的循环,是西方文学创作思潮发展留下的足迹。

确实,人类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难怪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批判性。新的理论和观念是在对旧理论和观念的不断否定中产生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既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适合于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与创作思潮的演变。

因此,如果我们对批评理论和创作思潮的探讨,不是得出某个结论,而是提出某些问题,也许更科学些。批评理论和研究的话语可以是自我对话的,而不一定是独白的,可以是敞开式的提问,与读者形成一个不断的动态对话过程。真理的存在是由探索中的问题构成的,我们的外国文学工作者难道不应该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外国文学研究难道不应该是“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吗?

摇摇二、逆向的发展:一个动态的阐释过程

翻阅以往外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研究者总是在不断地试图解决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既然真理的探索是由一连串问题构成的问题链,为什么我们还依然在努力通过归纳总结出一系列评价性的结论呢?这显然是与我们所习惯采用的外国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密切相关的。

在外国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评论界已经习惯于从创作产生的源头探索起,然后对每一国别、每一时期、每一作家的创作进行梳理,试图描述在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文学创作的特征,寻找出某一作家创作的主旋律,总结出某种文学创作的规律性,同时揭示他们的渊源关系,也就是总结出某种文学创作的传统,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这种以文学创作和批评正向发展为视角来研究的方法,已经为几乎所有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史撰写者们所采用,成为几乎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尽管接受美学、文艺阐释学等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但是这种作用仅仅还是留于理论探讨的认识层面,尚未对研究方法本身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其实,外国文学史并非只是一个正向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后人不断阐释和评说的过程。当一个作家不再创作时,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我们对他创作的阐释和评说却在不断地变化着,莎士比亚是这样,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几乎文学史上的每一位作家创作都是如此。而且,越是优秀的作家,其创作就越丰富、越复杂,给后人阐释和评说的空间就越大。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科学技术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者和读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新的认识添加到本来并不存在的创作文本意义中去。再说,外国文学研究还有一个语言翻译转换的过程,这不仅与读者和研究者的外语和母语水平有关,甚至与不同读者和研究者的认知思维模式密切相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国文学的发展史应该更是一部逆向发展的接受史。从时间上来说,正向发展无论如何是非常有限的,到作家本人去世或终止文学创作为止,而逆向发展则是无限的,只要人类的文学批评活动还存在,只要这位作家的创作还拥有读者,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比如对俄罗斯

大作家果戈里创作的评价，一开始别林斯基肯定他的早期创作，否定他的晚期创作，但是评论界早就开始重新探讨他的晚期创作，试图对它进行重新评价。对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时期也经历过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空间上来说，正向发展只是存在于作家本人可能接触的社会生活和文本范围之内，而逆向发展却几乎可以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去。我们常常这样说，一个作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伟大作家的创作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实际上，任何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评论都只是一个跨文化的历史阐释，这种阐释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更何况，这种阐释还是一种语言文本的阐释，一种经过翻译转换之后的语言文本阐释。正是这些阐释构成了一部部似乎是客观描述的外国文学史，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没有一部外国文学史不是一部异国批评家的阐释史，外国文学的发展史是逆向的，是一个动态的阐释过程。读者往往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下，阅读着经过转换的语言文本。这种文本是由非常不确定的载体构成的阐释。既然我们的研究评价根本无法避免时空的局限性，我们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是非常客观的，甚至还几乎都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历史误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去归纳和总结呢？为什么还要让后人以这些本身就很片面和局限的阐释作为进一步阐释的基础呢？

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研究的行动方式问题。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们几乎都是首先努力去阅读和理解外国作家的作品，然后再对其特点加以具体的分析，把分析出的成果转达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国外作家、作品与本国读者之间努力地实现着一种目的性行动，即把该作家和作品的意思和特点转达给本国读者。然而，目的性行动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研究行动方

式,它很难构成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对话交往。“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也就是想改变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话语行动方式,这便是外国文学研究问题意识探讨的重要目的,也是本文接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摇摇三、批评的行动:从目的走向交往

目的性行动的概念是由德国著名当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指出的一种人类社会行动方式。在他看来,人类的社会行动方式主要有四种:目的性行动,戏剧性行动,社会规范行动,交往行动。前三种行动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行动方式,目的性行动和戏剧性行动是由社会行动主体发出的一种由内向外的单向行动,社会规范行动则是由社会外界对行为个体的一种由外向内的约束力。哈贝马斯认为,最理想的行动方式应该是第四种,是一种双向互动对话的交往行动[缘]。哈贝马斯反复指出:“交往行动模式并没有把行动与交往等同起来。语言是一种交往媒体,是为理解服务的,而行动者通过相互理解,使自己的行动得到合作,以实现一定的目的”。“交往行动不是通过解释方式进行的理解活动而进行的”。“交往行动所表明的,是通过语言行动合作化,但不能借助语言行动概括的一种内部活动”[缘第 员卷 员页]。

在这里,哈贝马斯着重强调的是,交往行动是通过“相互理解”、“语言行动合作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交往行动是由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构成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得到了理论界普遍的关注和赞同。这样,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基于目的性行动方式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不能把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只看作是帮助读者理解作家创作意图和创作特色的一个中间传输环节,而且更应该去促进作者、文本

问题与文本

新世纪域外文学探索

问题与文本